

论马建忠著《马氏文通》

聂敏熙

0 引言

0.1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它问世于清光绪24年，即公元1898年。《文通》的出版是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在我国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的汉语语法研究从此摆脱了训诂学或者说语文学的附庸地位，真正独立地成为一门学科——语法学，并且为往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揭开了新的一页。

0.2 《文通》出版至今正好90个年头，已接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评议、研究之论著不断，或褒或贬，或毁或誉，各具见解，迄今也还很难说已求得完全一致的认识。长期以来，评论文字中，在涉及马建忠之所以著《马氏文通》时，多以马氏自己所说“此书系仿葛郎玛（grammar的译音，即语法，这里指西洋语法——笔者）而作”^①为根据，强调马氏模仿西洋语法而著《文通》一点。在议论《文通》之得失时，多所指斥的也是生搬硬套、机械模仿的缺陷。这样，模仿西洋语法就往往成为认识和论述《马氏文通》的出发点。既成之见难改。在今天，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仍然还有一定影响。模仿成书说不仅抹黑了《文通》这样一部富有创见的著作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掩盖了马氏何以“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以成此编”^②的主要原因和根本目的。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和认识《文通》，对于这样一些带根本性质的大问题，有继续进行合乎实际的探讨、分析之必要。

1 马氏著《文通》的主要原因和根本目的

1.1 与其说马建忠是我国近代的一位著名的语法学者，毋宁首先说马建忠是我国近代史上为振兴中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位早期改良主义者，是当时具有明显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马建忠的一生主要是为实现其改良主义的政治抱负而进行探索和实践的一生。马建忠之著《马氏文通》，不是盲目地崇洋模仿，更不是脱离或者逃避当时的社会现实到故纸堆中去讨生活，是他在变革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所从事的一个方面的实践，是为摆脱清朝末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希望改革远远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传统教育和教学的一项首创性的实践。

1.2 马建忠生于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五年，1845年；卒于戊戌政变后两年，1900年。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我们国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一双双贪婪的侵略魔爪争先恐后地伸向贫弱的中国，一副副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套上了被欺凌、被奴役的中国的脖子，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在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

中不可挽回地衰败下去，古老的封建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民处在内外反动派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之中。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自然地感到深切忧虑。他们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竭力寻求新的出路。如毛泽东所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③。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寻找真理，可以说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主张。他们是一些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具有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马建忠正是早期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属于当时较先进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马建忠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早年在上海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已使他受到一定影响。随后，于1877年赴法国学习政治和法律，并在巴黎先后通过文、理科的学位考试。学习和直接接触西方社会的过程，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终于最后成为积极主张并努力实践向西方学习的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成为正在中国发生和初步发展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1.3 马建忠曾依附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多方面参与过洋务派的活动，诸如上书言事、充当幕僚、受遣出国等等，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并不是为了体现洋务派集团的意志和愿望，《马氏文通》也绝非洋务运动的产物。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不难看清楚的。马建忠改良主义思想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以及他特定的生活经历中产生和形成，他为实现改良主义主张的活动也在特定的社会舞台上演出。洋务派官僚要倚重马建忠，是洋务运动的推行需要他这样的了解西方、通晓洋务、在同时代人对有关西方知识的掌握居于领先地位的人的参加和赞助；马建忠要积极参与洋务派的活动，自然首先是同洋务派有着一致的方面，即向西方学习的共同主张，当其对于洋务派官僚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缺乏实质性的深刻认识的时候，甚至不免对它寄予热切的希望。同时，还应当看到，马建忠，包括当时像马建忠这样的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得不依附洋务派的策略上的原因：要借助李鸿章等极有权势的洋务派官僚的保护，以对抗封建守旧的极端顽固派的反对；要靠洋务派官僚的看重和扶持，以加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其改良主义思想的社会影响。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在我国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在代表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的生动表现。所以，马建忠虽积极参与洋务派活动，却不能将他同洋务派官僚等同看待。洋务派官僚办洋务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和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马建忠作为资产阶级的早期改良派人物，则更多地系念于国家的贫弱、民族的危亡，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成为西方那样的富强之邦。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压迫、经济和文化侵略，愤然指出：“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④。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呼声和抗议，与洋务派一味“曲全邻好”（曾国藩语）的姑息苟安态度是泾渭分明的。他竭力主张“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能多得一分之计”^⑤，要求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以经济实力对付经济侵略。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洋务派官僚们是迥然不同的。马建忠以及像他这样具有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毫无疑问，直接为接踵而来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不容忽视的思想准备，与维新

派人物的政治见解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正是基于这一点，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对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给予高度评价，说：“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⑥

1.4 马建忠认为，要应付和解决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就得选择向西方学习的途径，通过向西方学习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⑦要民富国强，就不能忽视教育，不能忽视兴学、育才的大事。他对于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很不以为然，“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及少长也，则为之师者，就书衍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塾师固昧然也。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⑧这种只求神而明之、不求甚解的办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⑨。人的时间和精力造成惊人的浪费，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被严重忽视，不能“视其性之所近”，“各学有用之学”，“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⑩，难以有效地培养和造就人才。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大破语文神秘论的观点，办法是“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絨滕，导后人以先路。”^⑪这就是要揭示语言的语法规则让人们掌握。马建忠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一步，那么，“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⑫。这样，就能收到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效果，“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⑬。这就成为具有改革倾向的马建忠要著《马氏文通》的根本出发点。为此他坚持勤求探讨十余载，创前古未有之业，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汉语语法的巨著。马氏坚信他著此书“正可谓识当时之务”^⑭，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2 《文通》体现了马氏对汉语语法富有创见的、系统的研究

2.1 《马氏文通》是否确系模仿之作，不单要听马建忠的自述，还需要认真考查马氏对语法的理论见解，更需要实事求是地考查《文通》到底怎样对汉语语法进行描写和分析。

2.2 不错，马氏自己承认“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但这里的“仿”，当理解为效法，效法并不等同于模仿，并不意味着置汉语的实际于不顾，要全盘照搬西方语法的一套强加到汉语头上，不能因此简单地作出纯系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结论。马建忠讲得明白：“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⑮可见，马氏还是着眼于汉语的实际，是要吸收西洋语法的研究成果，将汉语同西语作比较研究，既要考察彼此相同之处，也要辨明相互不同之点，归根到底，是要阐明“华文义例之所在”，是以揭示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则为最终目的。他并不认为汉语与西语在语法上完全一个样，并不企图于经籍中求华文与西文无异之规矩，从未打算曲证繁引以证华文与西文义例之所同。相反，他认识到“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⑯，并非只看到不同语言间的共性而忽略各自的个性，并不否定不同民族语言的语法各有其民族特点。从马氏已有的认识高度已足以看出，所谓“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意在说明著《文通》一书是受西方语法的启发，并从那儿得到借鉴，不是说马氏著此书是一成不变地以西方语法的框架解释汉语的语法事实。“求其所同所不同者”，这话不可轻轻放过。求其所不同者，自然是要发现并阐明汉语所特

有的。求其所同者，也不能作为生搬硬套之口实。求其所同不等于强不同以为同，确有共同的东西存在，怎么不可以求？

2.3 诚然，《文通》未能完全摆脱西方语法的束缚，有一些明显牵强附会之处，这不必讳言。例如，受西方语法中“格”的概念的影响，在已经建立起词、语词、止词等句子成分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主次、宾次、偏次等“次”的概念，虽说不是毫无作用，毕竟显得多余，无怪何容说“徒然多立一套名目”。再如，比照拉丁语中双宾语句式，硬性将汉语的双宾语句作不同的处理。“公语之故，且告之悔。”承认是双宾语句，动词“语”、“告”之后分别带有两个止词；“魏王贻我大瓠之种。”不认为是双宾语句，析动词“贻”后之“我”为转词^⑩。据西方语法之“关系代词”而在汉语代字中分出接读代字一类，也属同一性质。这些均为人所共见。问题的关键在于，生硬模仿、牵强比附的东西在《文通》一书中到底占多大比重，居何种地位。总观《文通》全书，考查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可以肯定不能斥之为模仿之作，相反，它体现了马氏对汉语语法富有创见的系统研究。

2.4 《文通》指出“中国文字无变地，乃以介字济其穷。”^⑪“句读所集之字，各有定位，不可易也。……凡起词必先乎语词。语词而为外动字也，则止词后焉。……凡状词必先其所状。夫静字以肖事物者，亦所以状名代字也，故先其所肖焉。”^⑫看到了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虚词和语序成为汉语重要的两种语法手段。同拉丁语比较，拉丁语的语序比汉语灵活得多。在汉语里，不同的语序往往代表不同的结构，语序不同，语法结构往往也就不一样。起词（主语）在前，语词（谓语）在后；动词在前，动词所带的止词（宾语）在后；状语、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通常就是这样，各有定位。这非但不是对西方语法的模仿，倒正好指明了汉语语法与之不同的重要特点。

《文通》指出“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⑬这就肯定了汉语的词类是客观存在。虽然它也提出词无定类的主张，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如何耳。”^⑭但在谈字类假借时，还是说某字本何类，可见实际上仍是认为词有定类的。《文通》建立了基本切合汉语实际的词类系统。它注意到汉语的词类不同于西方语法，比如对于语气助词，就特别指出，“助字者，华文所独。”^⑮不是盲目地照搬西方语法，你划分为8类，我也划分为8类。马氏分汉语的词为9类，概括为虚、实两大类。实字5类：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虚字4类：介字、连字、助字、叹字。9类词的划分，大体上相当于现在划分的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和叹词。尽管各类词范围的大小与现在的不尽相同，一部分词的归类未必恰当，某些小类的划界尚欠清楚，但《文通》在将近100年前的词类划分，已经与我们今天对汉语词类的划分基本一致。它未列量词一类，数词则归属静字（形容词），那是因为古汉语里不像现代汉语拥有丰富的量词，数词在古汉语里有近似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它的处理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文通》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是很有见地的。这不是模仿，是继承，更是创新。

《文通》不以分类为满足，并不仅仅停留在词类划分上。对各类词的语法功能，细加描写，例如对连字、助字的分类分析就是很出色的。对某些近似之词，注意辨析其用法，阐明其异同。诚如马氏所说：“问尝谓《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之中‘之’‘其’两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以‘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⑧《文通》在这方面确实很有特色，“之、其”的用法，“之、焉”的用法，“矣、也”的用法，“也、焉、哉”的用法，以及“吾、我、予、余”用法的异同，“尔、汝、若、而”用法的异同等，无不详加论述，细致描写。这岂是模仿西洋语法模仿出来的？

《文通》提出起词、语词、止词等一套句子成分的术语，用以阐明词、词组在句法结构中的功能，揭示了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在论及汉语句式时，还指出“凡句读必有起、语两词”，“然则句之成也，必有起、语两词也明矣。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语不成。”⑨同时也论述了本无起词之句（无主句），如说：“大抵议论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⑩阐明了汉语的句式一般为主谓句，有主语与谓语；也有本无主语的无主句。并且还强调指出，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读未有无起词者。”⑪注意到了汉语句式与泰西语言一般句式的不同方面，对汉语句式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分析和概括。

《文通》是第一次对汉语语法作系统研究，就敏锐地发现了汉语的一些特殊句式，并进行了论述。例如，连动句、兼语句，《文通》作为“动字相承”问题专门加以探讨。古汉语否定句、疑问句等句法结构中代词宾语的位置，是《文通》最早作出规律性的说明，指出“凡外动字状以弗辞，或起词为‘莫’‘无’等字，其止词如为代字者，概位乎外动之先。”“询问代字为止词，则先其动字；为司词，则先其介字。”⑫这样敏锐的眼光，如此中肯的分析，同模仿西洋语法风马牛不相及。

《文通》不囿于西洋语法之研究，不以句子为语法研究的上限，它延伸到段落作分析；论词析句，常结合修辞，阐述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今天，语法学界的一些同志不是主张讲语法扩展到句组吗？不是在探讨语法、修辞如何结合吗？《文通》早已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足以启发后人。

以上仅择其要者概而论之，但已经可以看出，《文通》确是一部富有创见的前古未有之作，是马建忠在西方语法的启发下对汉语语法所进行的创造性研讨。它已注意到汉语在语法上的一些重要特点，主要在尊重汉语语法事实的基础上，划分了汉语的词类，建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阐述了各类词的语法功能，论述了汉语的句法结构成分，揭示了汉语的种种句法结构关系和句子的各种类型，对古汉语语法作了相当系统、全面的很有价值的分析和描写。所谓削汉语语法之足以适西洋语法之履，绝非《文通》主要的和本质的方面。一部首创之作能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有这样大的贡献，无愧为继往开来的一部划时代巨著。

3 从马氏著《文通》中吸取语言研究的有益经验

3.1 马建忠系念于国家、民族的振兴，坚持不懈地在学术上勤求探讨，终有所成。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马氏在语言研究上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更可以看到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的传统。今天，我国语言工作者肩负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有理由也完全应该发扬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实现四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巨大动力，在语言研究上作出远远超越前人的贡献。当今的语言学已经被誉为人文科学的带头科学，它所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已被运用于诸如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领域，语言工作者在语言研究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国语言研究的硕果一定能造福

于中华，造福于人类。

3.2 马建忠之所以能创前古未有之业，还具有一些重要的主客观条件。马氏通经史，于古文辞深有造诣，且具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⑧这才使得他能吸收西洋语法研究的成果，在西方语法的启发下将汉语同西语作比较研究，对本民族的语法进行系统的探讨。如果说没有对西方语法的借鉴就不可能写出《文通》这样一部语法著作的话，那么，不继承我国汉语语法研究的长期积累，同样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著作。西方语法的启示，我国长期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上所奠定的基础，同为《文通》成书的两个重要条件。马氏以前，从先秦两汉以至明清的三千年间，讲字词，论句读，涉及汉语语法研究的论述不少，散见于经籍传注、文字训诂、诗话以及笔记杂书之中，也有《助字辨略》、《经传释词》之类的专著。杨树达先生说：“文法之学，革路蓝缕于刘淇，王氏继之，大备于丹徒马氏。”^⑨马建忠使过去很不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系统化、体系化，是对我国上下数千年语法研究的系统继承和全面总结。

这为我们在没有止境的语言研究道路上开拓前进提供了可贵经验。

一个是专业素养问题。要有丰富的积累，要有一个坚实深厚的根底。马建忠的学术成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贡献很大，一批中青年语言工作者成绩卓著，无不证明这一点。根柢不牢，建不成万丈高楼，“水之积也不厚，则浮大舟也无力。”

一个是引进和吸收国外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成果问题。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政治上一边倒、学术上也一边倒的时期，凡西方的语言理论，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要用只能不亮牌子偷偷地用，要亮牌号就得先给它扣上一项资产阶级的帽子，然后给以批判、否定，这应当作为教训记取。国外的语言研究，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特别快，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到乔姆斯基，一句话，语言研究的各种流派相继出现。我们应当引进和吸收一切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要有分析地吸收合理的部分，当改造的要改造，不可以一味地追逐时髦，全盘照搬。举例来说，我们引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布分析方法，觉得用于分析汉语是可取的，但是可要当心，如果不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恰当运用，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或者引出不符合语言事实的结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够新颖了，但如果照搬那一套繁复的转换生成规则用于汉语，未必尽如人意，何况转换生成语法的那套规则能不能成立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国外有一些语言学家已经另起炉灶了。我们要引进，更需要对引进的东西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创建自己特色的语言理论，不能老是步人后尘。在今天，我们有条件比马建忠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

再一个是继承问题。我国的语言研究，源远流长，成就不小，丰富的宝藏尚需我们进一步去发掘。任何科学研究一向是承前启后的，语言研究也是这样，都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把我国传统的语言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一概斥之为陈旧、过时，就不可取。在国外，有所谓“除旧布新”的语言学者，认为1957年以前，即人们常说的乔姆斯基革命以前的语言学，没有多少值得传世的成果，也未必可取。实际上转换生成的理论是靠布龙菲尔德学派的传统形成起来的。马氏著《文通》，在如何解决继承和创新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肯定的经验，我们同样有理由比马建忠做得更好。

3.3 《文通》全书用例近万，可以想见作者实际占有的语言材料何等丰富。在此基础上，作者正面接触汉语的语法事实，分析说明复杂纷繁的语法现象，揭示可循之规律。这种科学

的求实精神也很值得继承和发扬。说得直率一点，这比自造一些语言里根本不那么说的句子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要高明得多。例句不是不可以造，但要十分小心谨慎，不可靠的语料不可能引出可靠的规律。语言研究首先就得占有足够的可靠语料，否则还研究什么呢？自造例句，即使造得句句正确，也很难展示所要探讨的问题的全貌，所以还是向马建忠学习，不图省事为最好。至于碰上问题绕开走，回避语言事实，那也是缺少马氏著《文通》那种敢于正视的勇气。举一个教材上的例子，是关于“是”字句的。“是”后边除了是名词性词语外，后边也常常是动词或形容词性，语词如“他是高明”，“他是读高中”。这种句子里的“是”与出现在名词性词语前的“是”相同还是不同？算什么成分？教材先后作了如下处理：

前几次的版本是：“‘是’用在谓语动词、形容词前，表示肯定，含有‘的确’、‘确实’的意思，有的必须重读，是副词，作状语。”

修订后开初的版本是：“‘是’用在谓语、主语之前，表示对某种行为、性质、事物的肯定。”不再提“是”的词性，也不再交代作什么成分。

再往后的版本，以上整段文字全删，干脆避而不提，只字不作交代了。

《马氏文通》问世90年了，我们今天纪念它，看来确有值得纪念的价值。

附注：

①⑫⑯《马氏文通·例言》

②⑧⑪《马氏文通·序》

③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④《适可斋记言·拟设翻译书院议》

⑤⑦同上，《富民说》

⑥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⑧⑨⑩⑬⑭⑮《马氏文通·后序》

⑰《马氏文通》卷四。

⑱同上，卷七。

⑲⑳㉑㉒同上，卷一。

㉓同上，卷二。

㉔同上，卷九。

㉕㉖㉗同上，卷十。

㉘《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二。

㉙杨树达《词诠·序例》